

红流纪事

武装暴动第一枪

南昌起义

武国友/主 编 黄一兵/著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红流纪事

武装暴动第一枪

南昌起义

武国友/主 编 黄一兵/著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装暴动第一枪: 南昌起义/武国友主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3 (2011.7重印)
(红流纪事)
ISBN 978-7-5472-0473-3
I. ①武… II. ①武… III. ①南昌起义—史料
IV. ①K263.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383号



红流纪事

武装暴动第一枪
南昌起义

WUZHUANGBAODONGDIYIQIANG
NANCHANGQIYI

主 编/武国友
著 者/黄一兵
出版人/徐 潜

责任编辑/康迈伦
责任校对/李洁华

装帧设计/柳甬泽 徐 震

印装/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98千字

印张/8

版次/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3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0473-3

定价/15.00元

丛书主编/武国友

副主编/王绍强 陈毓述 史义军

著者/黄一兵

编委会

主任/武国友

副主任/程舒伟 鲁晓红 王绍强

委员/周振华 赵丽君 杨兴朝 徐连英

智金华 殷明星 任曼劼 杨燕华

吴宝林 张宇英 马 铃

总 序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我们组织编写了《红流纪事》丛书，以志纪念。

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各类党史著作数以千计。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将一些重大事件独立写成一本综合性的小册子，合起来形成一套丛书，目前尚不多见。将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融合在一起，以此为骨架来展现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选择中共党史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需要做些筛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我们这套《红流纪事》丛书所选之“重大事件”，只选择了民主革命28年历史当中30件大事，力求通过这30件大事大体上涵盖中共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这首先就遇到了选取哪些事件最为合适的问题。就我们的水平而言，很难说就一定能够选得那么准确、恰当。但总体设想是，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为主，有的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经验或教训。

在选取事件的过程中，除以上一些考虑之外，经过反复综合、权衡，觉得还应有下列标准：一是体现重要性。也就是说，所选事件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二是注重代表性。所说的代表性，就是某件事可能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影响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它可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对这样的事件也选取了一些。三是注重平衡性。所说的平衡性有两层意思：其一，处理好事件与事件之间的

交叉。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因受事件独立性的限制，相互之间必须避免重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撰稿过程中，通过详略取舍的办法作了一些处理。其二，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共早期组织，工农运动、军事斗争，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各苏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各大战役，等等，都有所选取，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尽管作了上述一些考虑，但由于每一小册子都是以某一事件为中心独立成册的，所选事件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已出版的党史书籍。通过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直书。严格地说，这套书还不算是一套学术著作，而是一套近乎通俗性的读物。努力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又力求文字朴实、通俗易懂，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目前这套丛书与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距离，与读者的期望还会有很大差距，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谅解。当然，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此书的同仁、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 者

2011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 引子	9 /
★ 血雨腥风	10 /
★ 一次错误的“结盟”	19 /
★ 决策南昌起义	23 /
★ “我到九江, 第一个通知叶挺”	27 /
★ 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关键抉择	31 /
★ “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37 /
★ 起义队伍又揽一位大将	43 /
★ 突然而至的“最高指示”	46 /
★ 我决定带部队举行起义	51 /
★ 今晚有惊天动地的大举动	56 /
★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60 /
★ 南昌城里响起枪声	63 /
★ 战斗在牛行车站	70 /
★ 贡院遇到顽强抵抗	73 /
★ 欢腾的城市	77 /
★ 大军南征	81 /
★ 蔡廷锴带走一个师	86 /
★ 在抚州的日子	94 /
★ 南进途中第一仗	99 /
★ 三河坝分兵	111 /
★ 浴血汤坑	114 /
★ 再失三河坝	121 /
★ 不灭的火种	124 /



引子

位于南昌市中山路中段 380 号的江西大旅社始建于 1922 年，出资者是南昌著名的资本家包祝峰等人。1923 年，耗资 40 万块银元的江西大旅社建成开张。这座高 4 层的“回”字形建筑，成了当时南昌城里最豪华的大旅社。在大旅社一楼喜庆礼堂的案几中央，供奉着福禄寿三星，两边摆放着时钟、屏风和两面镜子。之所以放着“时钟”、“屏风”、“镜子”，是取“始终平静”的吉祥之意。但让主人始料不及的是，大旅店开张 4 年后，1927 年 7 月 25 日，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从九江开赴南昌。到达南昌后，便以“二十军第一师师部”的名义把江西大旅社包租下来。6 天之后，以这里为中心——南昌起义爆发了。



血雨腥风

1927年3月下旬某日，黄绍竑在南宁接到李济深从广州拍来的急电，要他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由于黄绍竑家眷住在广州珠江颐养园，时常去广州，因而这次去广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黄绍竑乘专轮到广州后，在颐养园稍作休整，便直奔李济深府宅。

10

一见面，李济深便取出一份蒋介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内容是要李济深和黄绍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问题。电报里虽然没有说明是什么重要问题，但是李济深和黄绍竑都不约而同地料定，一定都是为了反共，因为这个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公开了。

黄绍竑和李济深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彼

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于是，就决定同去上海。李济深告诉黄绍竑，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他并且提醒说，现在码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监视很严，因此行动要格外小心。

黄绍竑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夫人甚为吃惊，也觉得这次行动非同小可，为了更便于秘密行动，她劝黄绍竑把留了六七年的络腮胡须剃去。

黄绍竑匆匆剃去胡子后，坐了一艘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轮船泰山号。在泰山号船上，同李济深见了面，同行的还有冯祝万（那时他是参谋长还是财政厅长，已记不清）、陈孚木及随从一人。

一行人当晚 10 点多钟就到了香港，有人早已在码头上秘密迎接。

下了省港轮船泰山号，黄绍竑等马上就上了美国邮船底亚士总统号。第二天，邮船就向上海开行了。

在由香港赴沪途中，李济深和黄绍竑几次长谈，交换意见，内容无非是补述一些当地情况和商量到上海以后的共同主张，由陈孚木作记录。陈孚木是廖仲恺被刺时同时遇难的陈秋霖的老弟，此行担任秘书的任务。

4 月 2 日上午，邮船驶入黄浦江，还没有泊码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谋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乘海关小火轮到船上来迎接了。他一见面，就告诉说，租界里万不能住了。他说：“自从我军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他们同租界里的外国军警隔着铁丝网对峙着，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便，而且很危险。白总指挥要你们两位到他的总指挥部去住。”

于是，黄绍竑一行乘小火轮直接前往设在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

在去指挥部的路上，黄绍竑等人看见长江上的外国兵舰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区，这让他们更加感到形势的危急。

船到了高昌庙，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码头上迎接。上岸后从叙谈中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到了上海。

在黄绍竑一行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蒋介石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同来的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挥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

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说：“13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与会者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

李济深首先报告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

黄绍竑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他最后明确表示“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在会上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

南京惨案又叫“三二四”惨案，是指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北洋军阀部队眼看守城无望，便准备渡江撤退。这时，南京城里的一些兵痞和流氓乘机进行抢劫。24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城，骚乱继续发生。下午3时40分，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军舰竟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向南京城内进行猛烈炮击，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酿成炸死炸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毁坏房屋无数的南京惨案。惨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向中国大量增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经过两年多的谈判，南京国民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道歉、赔偿，并答应惩办“骚乱”分子，而对中国人民所遭到的惨重损失却只字不提。

对于南京惨案，何应钦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辩护，把南京惨案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说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这次会议上，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

白崇禧还诬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驻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他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

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吴稚晖的发言满口无锡土音，许多人都听不大听得懂，只听见他说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

会上，陈果夫不大说话。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伙计。

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部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

在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

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

这份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主要是：

……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径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议，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4月2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5人，只占全体中监委20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3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3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3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4月2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

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蒋介石的这个复函来看，似乎蒋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

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后，于4月9日离开上海前往南京，躲在幕后指挥。临行前，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交给白崇禧、杨虎、陈群具体执行。

就在蒋介石离沪的当天，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陈果夫、蔡元培、古应芬8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声称：“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纓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蒋介石通过各监察委员发出的这个反共通电中，人们可以听到霍霍的磨刀声了。

正当上海地区反共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时候，杭州、重庆先后



于3月29日、3月31日连续发生反共事变。4月3日，福建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反革命政变。

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发生的一连串的反共事变，是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预演。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服的各省一律“清党”的密令，上海形势骤变。当天下午，驻防上海的第二十六军与“工界联合会”人员布防街市。深夜，帝国主义侵略军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1000多人，解送驻龙华的蒋军司令部。

4月12日凌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配合下，隐藏在租界里的“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地痞和青红帮分子，臂缠“工”字袖标，打着工人旗号，全副武装冲出租界，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发生冲突。这时，遵照白崇禧发出的“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的命令而一直尾随在流氓地痞后面的周凤岐第二十六军士兵，便以制止工人“内讧”为借口，用欺骗威胁或武力手段，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纠察队驻地的物品被抢劫一空。拥有2700多人、1700支枪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在遭受袭击后几个小时内就被缴了械，上海总工会驻地闸北湖州会馆也被占领。当天，白崇禧部还搜捕共产党“首要300余人，攻破大小机关80余所，仅一日功夫，而‘清党’之工作告成”。

事件发生后，白崇禧为欺骗舆论，在当天发表通电称：“本早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同时，白崇禧还发布严禁罢工的布告，声称如发生罢工，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反动派气势汹汹，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和白崇禧的高压政策，激起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强